

# 美国经济周期研究

陈宝森 郑伟民 著  
薛敬孝 蔡述理



商务印书馆

# 美国经济周期研究

陈宝森 郑伟民 著  
薛敬孝 蔡述理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年·北京

# 美国经济周期研究

陈宝森 郑伟民 著  
薛敬孝 蔡述理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77-4/F·175

---

1993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

印数 2100 册 印张 10  $\frac{1}{2}$

定价：7.00 元

## 前　　言

周期性经济波动和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由于它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不安，西方朝野早已致力于探索它的原因，寻求消除它的手段。在发生 1929—1933 年大危机之后，这种努力更加强化了。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经济波动必然要发生世界性的影响。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不对美国经济的盛衰劳枯予以关注。这既是认识这个国家经济特征的需要也是同她进行经济合作的需要。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研究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对美国各派周期理论的短长进行客观的介绍与评价。

第二章以马克思主义周期理论为指南研究美国经济周期与危机的内在根源，运动规律和传动机制。

第三章对美国经济周期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的特点以及影响周期变形的因素。

第四章研究美国政府反周期波动的政策与实践，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作用和得失给以评价。

第五章介绍美国对经济周期与危机进行预测的各种方法，探求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南借鉴西方的方法提高我们预测能力的途径。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列入七五计

划。由陈宝森、郑伟民、薛敬孝、蔡述理四位同志共同编写。陈宝森负责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前三部分；郑伟民负责第三章；薛敬孝指导刘沛编写第五章经济计量模型部分；蔡述理负责第五章最后一部分。

本书初稿完成后曾举行小型讨论会邀请同行专家孔凡昌、李长久、薛伯英，商务印书馆吴衡康、张宗理，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温伯友等同志与会进行评议。在修改中吸取了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经济周期与危机是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我们在写作之前虽然在美国做了调研，并搜集了大量书籍和资料，但限于水平，错误和疏漏之处必多，热切期望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作 者

1992年8月

# 目 录

前言	( 1 )
绪论	( 1 )
第一章 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在美国的发展	( 12 )
第一节 “古典”周期理论的输入和在美国的创新	( 14 )
第二节 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和凯恩斯 主义周期与危机理论在美国的发展	( 29 )
第三节 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和 周期理论在美国的返祖现象	( 50 )
第四节 向纵深发展的美国经济周期理论	( 70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周期理论和美国经济 周期运行机制	( 83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理论	( 83 )
第二节 关于利润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 99 )
第三节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动机制	( 115 )
第四节 关于 80 年代经济周期的传动机制	( 123 )
第三章 美国经济周期的历史考察	( 127 )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美国经济周期	( 127 )
第二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经济 周期发展进程	( 141 )
第三节 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发展进程	( 155 )

第四章 美国政府反周期波动的政策与实践	(170)
第一节 早期国家干预主义阶段	(173)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主导阶段	(197)
第三节 新保守主义主导阶段	(225)
第五章 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预测	(246)
第一节 经济周期波动预测在美国的发展	(246)
第二节 指标法的经纬	(251)
第三节 判断法和调查法的广泛应用	(269)
第四节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预测	(279)
第五节 对美国经济周期预测应注意的问题	(313)
英文参考书目	(324)

## 绪 论

资本主义经济是在繁荣和危机的周期循环中发展起来的。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不可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要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则不可不研究美国经济周期。美国是当代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作为第一超级经济大国，其经济的盛衰荣枯不可能不发生世界性的影响。

美国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的。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的统计，从 1854 年 12 月到 1982 年 11 月的 128 年中这个国家共经历了 30 个经济周期，从谷底到谷底，平均 51 个月，收缩期为 18 个月，扩张期为 33 个月。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周期差异极大，最长的达 117 个月（1961 年 2 月—1970 年 11 月）最短 28 个月（1919 年 3 月—1921 年 7 月；1980 年 7 月—1982 年 11 月）。危机的严重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从跨度说 1873—1879 年的大危机长达 65 个月，堪称危机长度之最，其次是 1929—1932 年的大危机长达 43 个月。然而就给社会造成的震荡而言，后者远甚于前者。原因是 20 世纪美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大为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垄断资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都激化了。仅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工业化程度还比较低，1870 年美国全部就业人口为 1290 万，其中受经济危机打击最大的制造业、矿业、建筑业、商业、运输业等的就业人口为 428 万，约为五分之一，比重不大，而且 1890 年以前美国的

西进运动仍在发展对失业者可以起安全阀作用。到 20 世纪上半叶，情况有了很大变化，1929 年美国就业人口为 3534 万，其中属于上述易受危机冲击的行业有 2162 万人。约占 61%。在这次危机中失业人口由 1929 年的 155 万猛增至 1933 年的 1283 万，占总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西部边疆的开拓又已到达尽头，所以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就特别深重。可见 1929—1933 年大危机成为促使美国走向成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契机不是偶然的。自此以后国家的宏观调控就在反对经济周期波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经济危机的深度有所减轻，危害较前缩小；尽管如此，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危机仍然无法消除，它继续给劳动者造成灾难，引起社会的不安。就以最近这次经济衰退而论（自 1990 年 7 月开始），仅仅 1990 年两个季度的经济滑坡就使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从 1989 年占人口总数的 12.8% 上升到 1990 年的 13.5%，人数由 3150 万上升到 3360 万。在某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如密西西比，贫困人口上升到 25%。巴尔的摩城是一个比较老的以大烟囱产业为主的城市，那里的失业率特别高，1992 年 1 月美国众议院银行金融与城区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冈萨雷兹和其它议员在这个城市教堂宽敞的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失业者纷纷上台倾诉自己的苦衷。40 岁的电工杰丽·威廉斯说他曾经历了几次经济衰退的风风雨雨，可是这次真的走头无路了。他才从金莺体育场的新建筑工地上被裁减下来，现在要为养活他的妻子、一个 8 岁的女儿和一个 15 岁的患孤僻症的儿子苦苦挣扎。单身母亲露丝·胡珀说她本来在一个出名的律师事务所中当法律助理，一小时挣 16 美元，解雇后在一家商业区的饭店中权充门卫，一小时挣 7 美元。她说这是份苦差使，要能维持家庭生活你既不能生病更不能去寻死。24 岁的迪莉西亚·福特在她两岁的女儿生哮喘病需人守护的时候丧失了面包厂襄理的职务和住房。有一段

时间她和她的女儿同两个哥哥、一个老祖母同住，但只有她出房租，后来租金也付不起了，就被赶了出来，只好在几位女友家中轮流借宿，直到住进政府办的临时寄宿舍。40岁的万·约翰逊是一位失了业的建筑师，他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已经陷入艰难境地。可是这个社会对他视而不见。他说：“我为作一个美国人而骄傲，但我为美国感到耻辱。”<sup>①</sup>1992年6月美国失业率上升到7.8%，有998万人处于巴尔的摩城这几位失业者的相同处境。这对于富甲天下的美国说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创痛。

美国经济学家劳合·瓦连廷在他所著的《经济周期与预测》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讲了这样一段话：“不时发生的经济萧条给许多人造成了无法诉说的损失和痛苦。事实上这样一种说法是有一定感染力的，即历次经济大萧条时期中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已使自由企业制度成为人们所不能接受的东西。……因此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在自由社会的框架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继续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准。”(Valentine 1987, p.2-3)

瓦连廷是站在资本主义卫士的立场看待西方经济周期和危机的。但是科学研究需要的是摆脱西方偏见的彻底性。这一条当然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瓦连廷先生和其它西方经济学家的。我们要做的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周期及其运动规律以加深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和对西方经济趋势的判断能力。

后一条，今天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坚定地奉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要在贸易投资与金融业务等方面与西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我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相互依赖必然会日益加强。其中中美经贸关系拥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自

---

<sup>①</sup> 《华盛顿邮报》，1992年1月25日，记者保罗·西瓦廷报道。

1972 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以来，中美双方经贸关系有了长足进展。在贸易方面 1991 年双方贸易额已达 142 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三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列第 13 位。在直接投资领域到 1991 年底，美方在中国已有各种投资项目 1998 项，协议金额 49.2 亿美元。美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名次仅次于居第 5 位。中国在美国开店设厂也有进展，到 1991 年底非贸易项目共 132 个，投资金额 4.74 亿美元。在金融领域美国芝加哥第一银行以及花旗、美洲、大通、汉华实业、化学等银行都在我国设立了代表处，并在深圳、上海等地设立了分行。今后中美经贸关系必将随时间的推移，冲破各种政治障碍而更加密切。在这种态势下美国经济的繁荣或衰退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双重影响，我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美国经济繁荣，美元升值对我出口有利，而高汇价则对我进口不利。繁荣后期利率上扬对我引进美国资本也会不利，而衰退期间则依严重程度的不同而可能发生不同的影响。此外随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阴晴变化，美元对其它国家的汇率变化、利率变化对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外债发行中，外汇储备中选用何种币种，按何种货币结算价格都有重大关系，稍一不慎就会蒙受巨大损失。随着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股票债券市场的变化也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方面。而这一切变化都必须以经济周期变化规律为主线，结合其它非周期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本书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动规律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对西方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和手段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经济周期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大题目，对它的研究可以从各方面展开。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触及每一个侧面。在设计本书的框架时我们就以下三方面做了取舍。

- (一) 在工业周期波动和农业非周期波动的问题上的取舍；
- (二) 在各种周期理论、学说上的取舍；
- (三) 在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上的取舍。

首先，在工业周期性波动和农业非周期性波动方面我们着重研究工业周期波动。

我们认为这样做符合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经典论述，也同美国研究经济周期的权威机构、权威人士的界定相一致。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的创始人米切尔和伯恩斯在 1946 年为经济周期做了如下界定：“经济周期是在主要以工商企业形式组织其活动的那些国家中所看到的总体活动的波动形态。一个周期包含许多经济领域在差不多相同时间所发生的扩张，跟随其后的是相似的总衰退，收缩和复苏，后者又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结合；这种变化的序列是反复发生的，但不是定期的；经济周期的长度从一年以上到十年、十二年不等；它们不能再分为性质相似的，振幅与其接近的更短的周期”。(Gordon 1986, p.3)

马克思没有专门给经济周期下定义，但是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特点。例如他在一个地方说“……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同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其顶点就是普遍危机。”<sup>①</sup> 在另一个地方他说：“在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 1825 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sup>②</sup> 他还说过：“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2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6—17页。

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到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sup>①</sup>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虽然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米切尔等人也认为经济周期是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制度的国家所特有的现象。马克思则不仅描述了资本主义周期循环的现象形态而且揭示了它的根源。另一点是马克思把经济的周期循环明确界定为现代工业的周期循环把它同现代工厂制度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则比较含糊，有时称经济周期循环为商业循环。这一点倒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工业的生产过剩会在现象上表现为商品滞销，库存积压，由此又引发金融领域的信用危机。如果只看现象，自然会把经济周期波动说成是流通领域的问题。

根据以上对经济周期的界定，我们认为在本书中着重研究工业周期，不会妨碍我们对经济周期认识的深度。

首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属于工业特别是大机器工业发展成熟以后出现的病症。生这种病完全是由于机器大工业可以随资本积累的扩大而迅速膨胀，使生产无限扩大，而市场则相对狭小，由此导致生产过剩，这时资本家在利润机制的作用下，就要控制生产减少投资，从而又使整个经济迅速收缩。马克思所说的“热病式的生产”就是这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是机器大工业的运动形态，工业在这里起主导作用。毫无疑问，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互相影响的。但必须先弄清机器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运动规律才能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农业而不是相反。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7页。

其次，资本主义农业也有自己的繁荣和萧条，但它往往并不与工业周期同步。从农业本身的特点说，它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在生长周期气候以及耕地面积的约束下它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只要扩大资本积累就能使生产无限扩大，又由于生产者的分散性形成不了寡头垄断的格局，也不能像工业那样在价格暴跌、利润猛降时立即减产实行全行业的收缩。所以农业的萧条往往要比工业更加旷日持久。就美国农业说，它又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点。这就是美国农业生产就本国的需求说早已过剩。现代的美国农业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美国出口的小麦要占近 50%，油脂近 60%，玉米 70%，大豆则超过 80%。所以美国农业的繁荣与萧条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国际市场的变化。远的不说，在 20 世纪中美国农业经过三次繁荣，头一次是从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其它地区受战争破坏，美国变为世界谷仓，这时农场主收入增加，前景看好，就扩大资本积累，加速机械化，改善耕作条件，使产量大增，可是战争一结束，世界其它地区农业得到恢复，美国农业就又陷入萧条。本世纪美国第三次农业大繁荣则发生于 70 年代初。由于世界谷物歉收，苏联大量向美国抢购粮食，而使美国农场收入猛增，后来又由于卡特总统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以及欧共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而陷于萧条。所以，如果说从 1900 年到 1980 年美国已经有过 18 个工业周期，那么就农业说从繁荣到萧条的循环则只有三个，农业萧条持续的时间显然要比工业长得多，它们是受与工业周期不同的条件制约的，尽管每次工业危机也会对农业产生影响，但农业的繁荣与萧条应当是可以另行研究的专题。

第三，工业周期与农业的萧条和繁荣彼此的互相影响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减弱。其原因，第一是政府干预的作用。30 年代的

大危机是工业与农业相互交织的大危机。工业危机的爆发加重了本已存在的农业危机。从此开始了政府对农业的直接干预，采取了限产、限售、价格支持等手段。这套办法尽管受到主张自由放任的人如里根总统的反对，但直到今天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农业的繁荣与萧条在政府的干预下已经变了形，特别是农产品价格补贴，它对工农产品剪刀差在经济危机中的扩大起了一定缓解作用。第二是战后以来在工业危机和农业萧条中彼此对工农产品的交换都不再发生很大影响。工业与农业是通过工业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如农业机械、农药、化肥等和农业向轻工业提供原料，如粮食、油脂、棉花等而联系起来的。轻工业中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生产的是非耐用消费品。我们从战后的统计资料中发现在每一次经济衰退时期与耐用消费品不同，非耐用消费品都是继续增长的，没有一次有下降趋势。所以战后历次工业危机并没有减少对农业原料的需求。反过来说，农业萧条虽然会减少对农机、化肥、农药的需求，但是这些部门的产品在制造业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以 1987 年为例，当年制造业总销售额近 2.5 万亿美元，农机、农药、化肥的销售额加起来不过 258 亿美元，只相当于制造业销售总额的 1.04%。即使加上其它农业所需的工业品，这个比例也不会大多少。所以即使在农业萧条中减少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它对工业生产的总形势也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本书中略去对农业危机的考察是无伤大雅的。

关于对各种周期理论的取舍，我们的选择是以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和大危机后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为重点，对象是实际生活中的工业经济周期和危机，对其它各种周期理论则从略。

目前在西方颇为流行的周期理论还有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周

期理论、库兹涅茨的长波周期理论、朱格拉中波周期理论、基钦的短波周期理论以及熊彼特综合长、中、短波三种理论而形成的创新周期理论。

长波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首推康德拉季耶夫(Nichola D. Kondratief)。康氏在 20 世纪初叶对 18 世纪以来的英、美、法之间的物价指数进行了整理分析，发现从 1789 到 1849 年这 60 年中物价由上涨到下降，形成了一个波动期；从 1849 到 1896 年这 47 年中又有一个物价由上涨到下降的波动期。从 1896 到 1920 年则有一个物价的上涨期。康氏的论文发表于 20 世纪 20 年代，所以他只考察了两个半长波。在这两个半长波中，物价上涨时期均为 24—25 年，彼此很接近。康氏认为物价的涨落反映了经济的繁荣和萧条，而导致这种波动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战争、革命和黄金采掘四大因素。此后这个 50—60 年的长周期即以康德拉季耶夫命名。

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 (Clement Juglar) 是中波周期的发现者之一。他于 1860 年根据英、法、德、美国四国工业设备投资的变动情况发现每 9 至 10 年完成一次工业经济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在研究长波周期时也注意到朱格拉周期，并发现在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朱格拉周期的繁荣阶段持续较长，而在长周期下降阶段，如果与朱格拉周期的萧条阶段重叠，则萧条会更加持久。

还有以基钦命名的短波周期。美国经济学家基钦 (Joseph Kitchin) 研究发现在经济活动中有一种有规律的短期波动，其长度约为 40 个月，这种波动同商业库存的变化有关。他的论文于 1923 年发表。

此外，俄裔美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1930 年出版的《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考察了美、英、法、德、比利时等国从 19 世纪初叶或中叶到 20 世纪

初，几十种工业、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变动情况，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平均长度为 15—20 年不等的“长波”。

我们认为第一，上述经济学家通过整理分析历史数据，发现了某种较为规则的长短周期运动，并探讨了它背后的根源，这对拓宽人们认识经济周期的视野大有好处，他们的成果应当受到重视；第二，所有这些理论还只能说是历史现象的描述，是过去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对未来的假说。第三他们的共同弱点是不触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运动机制，因而显得缺乏深度。因此要把假说上升为规律，一方面必须用新的历史发展进一步加以验证；另一方面则必须深入探索现象背后的内在关联。这些显然都不是这本书所能完成的任务。

至于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两个问题，我们着重研究的是周期性经济危机。

什么是周期性危机？按马克思的提法，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各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因此我们研究经济周期不能不把它的这个顶点作为重点。

对什么是结构性危机还缺乏明确界定。一般的看法，它是由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是非周期性和长期性的。人们把石油价格猛涨、经常性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经常性贸易逆差、债务危机等都看作是结构失衡或结构性危机的表现形式。这种失衡往往是由外部事件的冲击或内部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因此，它与由周期因素所引起的危机不同，受不同机制制约。

尽管两种危机的起源不同，不容否认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们总是交织在一起，并且相互发生影响的。

拿美国说，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我们看到两种不同形式的结构性失衡或危机。在 70 年代是“停滞膨胀”，在 80 年代是由借贷过度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以及财政困境。